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缘起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学科发展十分迅猛,成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1985年,国家对原有学科进行大规模调整与合并时,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并将它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我们认为,这样的合并是符合学科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要求的,为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今后我们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上观照中国文学,提供了有力的学科依据。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名牌老系,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方面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和丰厚的积累。缘年代前期,在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穆木天教授和彭慧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全国最早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最早开办俄苏文学研究生班,最早编写东方文学教材和参考资料并开设东方文学课程。改革开放后,在陈博教授、匡兴教授、陶德臻教授等先生的努力和主持下,被批准建立了全国首批世界文学硕士点,在全国首批组建了比较文学教研室并开设《比较文学概论》课程,率先招收欧美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三个研究方向的研究生。1985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合并后,我们又成为全国第一批获得该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我们认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责任、有条件,为我国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

缘 起

员

与江西教育出版社联手 ,成立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 ”,出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丛书》将从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 ,不求面面俱到 ,而是发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科上的优势和特长 ,在以前研究较薄弱和完全没有研究的领域内立意选题 ,或者推陈出新 ,在传统旧课题的研究中更新观念 ,创设新体系 ,运用新方法 ,补充新材料 ,提出新观点 ,陆续推出一批填补空白的、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急需的著作。到 1994年下半年 ,即北京师范大学建校 70周年校庆时 ,基本实现出版计划 ,并以此作为我们给校庆的一份献礼。我们期望 ,丛书的出版 ,将有助于推动 21世纪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最后 ,我们衷心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列为 “十五 ”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东方各国
文学在中国

圆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

编辑出版委员会

1994年 10月 18日

前言

前言

员

我国对东方各国文学的翻译、评论和研究,已经拥有上千年的历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早在东汉末期,我国就开始翻译印度的佛经文学,至唐代达到极盛。对佛经文学的翻译,是我国翻译文学的肇始,也是我国东方文学译介的开端。印度的佛经文学、民间文学对我国的小说、戏曲、诗歌、民间文学等的巨大影响,已是文学史上人所共知的事实。在 19 世纪的一百年间,我国对东方文学的译介从印度佛经文学向东方各国纯文学转移,对印度等南亚各国,日本、朝鲜等东亚、东南亚各国,阿拉伯、波斯及中东各国文学的翻译、评论和研究,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粗略的统计,在 19 世纪的一百年间,我国出版的东方各国文学的单行本的中文译本(含复译本),就多达四千余种。其中日本文学的译本最多,达两千余种,印度文学居第二位,近五百种;阿拉伯—伊斯兰及其他中东各国文学的译本居第三位,共二百来种,如果算上《一千零一夜》的各种改编、改写本,则有四百来种;其他东方国家,如蒙古、朝鲜等东亚各国和

越南、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各国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文学的译本也有二百来种。19世纪以来,东方各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种种影响,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印度的泰戈尔,日本近现代作家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日本左翼文学及当代作家川端康成等,都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评论和研究方面,一百年间,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东方文学(不含有关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的比较研究)的研究论文有四千多篇。其中,1909年至1949年近八十年间,平均每年发表约十五篇;1950年至1979年的二十年间,平均每年发表一百三十多篇。1980年以来,出版的各种东方各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教科书、专著等已有近百种。其中,有关东方文学史类的东方文学总体研究的著作和教材,也有三十来种。近二十年来,我国一些大学的外语院系,如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延边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都建立了东方国别文学(如印度文学、日本文学、朝鲜文学、阿拉伯文学等)的硕士和博士学科点;在有关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等)的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可以培养东方总体文学研究和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硕士、博士。在学术研究、学科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由此可见,在我国,东方文学作为外国文学中与西方(欧美)文学相并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知识部门,作为一个阅读、评论和研究的领域,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形成并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规模。但是,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却没有总结,没有书写。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东方文学学科史方面的专门著作。

本书就是为了适应我国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需要而撰写的。作为第一部中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史,本书试图采用历史学和比较文学相结合的方法,立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把“东方文学”作为研究和陈述的大语境,全面、系统而又有重点地梳理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评论研究的历史。

本书的题目是《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这里所谓的“东方各国”,所指涉的范围是亚洲和非洲北部各国。它由源远流长的三大文化区域构成。一是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域;二是传统上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东南亚文化区域;三是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主体,包括犹太文化、波斯文化在内的中东(包括西亚、中亚和北非地区)文化区域。从这样的文化区域的界定出发,本书的前三章分别研究三大文化区域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情况。第四章则由分到合,评述我国在国别文学基础上的东方总体文学的研究。

《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中所谓“在中国”,指的是东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它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中国的东方文学翻译或称译介的情况,一是东方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情况。中国的东方文学的译介,是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的东方文学的译介,实际上就是书写中国翻译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而对东方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则是建立在对东方文学的翻译基础上的,它体现着中国人对外来文学的独特的感受、认知、理解、评价和判断。翻译与评论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东方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和接受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的东方文学学科的历史。因此,《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这个课题,既是对我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史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翻译文学史和对中国与东方各国的文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因而本质上也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

《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既要研究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又要评述中国对东方各国文学的评论与研究情况,涉及的范围和论题很广。在一本篇幅不算太大的著作中对此加以论述与研究,只能是概略的。因此,本书相应地采取了史实概述与学术评论相结合的形式,并加上了一个副标题——“译介与研究史述论”。对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全面、深入和缜密的研究,还有待于后来者。

目
录

前 言

第 员章 印度及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学在中国

第一节 对印度文学史的研究.....	(员)
一、研究印度文学史的困难性与重要性	(圆)
二、两种《印度文学》	(猿)
三、梵语与印地语文学专史	(愿)
四、综合性多语种印度文学史	(缘)
第二节 佛经文学的翻译	(缘)
一、佛教东传与我国佛经翻译文学	(缘)
二、汉译佛本生故事与佛传故事	(愿)
三、汉译譬喻文学	(愿)
四、《法华经》与《维摩诘经》	(圆)
五、对佛经文学翻译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缘)
第三节 印度两大史诗的译介	(圆)
一、对两大史诗的初步译介	(圆)
二、《罗摩衍那》的翻译与研究	(猿)
三、《摩诃婆罗多》的翻译	(猿)
第四节 古典梵语诗剧、诗歌与诗学的译介	(缘)
一、对《沙恭达罗》等古典诗剧的翻译与研究	(缘)
二、对古典诗歌的翻译与研究	(源)
三、对古代诗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	(缘)
第五节 泰戈尔的译介	(缘)
一、圆年代前半期 译介的第一次高潮	(缘)

目 录

员

二、 1949 年代 :译介的第二次高潮	(150)
三、 1949 年代 :译介的第三次高潮	(153)
第六节 对普列姆昌德等现代作家的译介	(154)
一、 1949 年代对普列姆昌德的译介	(154)
二、改革开放后对普列姆昌德的译介	(156)
三、对萨拉特、钱达尔和安纳德等作家的译介	(157)
第七节 对南亚、东南亚其他国家文学的译介	(158)
一、对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南亚诸国文学的译介	(158)
二、对东南亚各国文学的译介	(160)

第 四章 中东各国文学在中国

第一节 古巴比伦文学及《吉尔伽美什》的译介	(162)
第二节 犹太文学及《希伯来圣经》的译介	(163)
一、对《希伯来圣经》及犹太文学的翻译	(163)
二、对犹太文学的评论与研究	(165)
第三节 波斯古典文学的译介	(166)
一、 1949 世纪 1949 年代前对波斯文学的译介	(166)
二、 1949 年代对波斯文学的译介	(167)
第四节 阿拉伯文学的译介	(167)
一、对阿拉伯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	(167)
二、《古兰经》的翻译	(167)
三、《一千零一夜》的译介	(168)
四、对其他古典名作的译介	(168)
第五节 对阿拉伯—伊斯兰各国现代文学的译介	(168)
一、对埃及、黎巴嫩、土耳其等中东各国现代文学的译介	(168)
二、对纪伯伦的译介	(169)
三、对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译介	(169)

第 五章 日本及东亚各国文学在中国

第一节 对日本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	(170)
一、 1949 世纪上半期的日本文学史介绍与研究	(170)
二、 1949 世纪下半期的日本文学史研究	(170)

第二节 日本古典文学的译介	(页码)
一、和歌、俳句的译介	(页码)
二、《源氏物语》等古典散文文学的译介	(页码)
三、古典戏剧文学的译介	(页码)
四、市井小说的译介	(页码)
第三节 日本近代文学的译介	(页码)
一、对 19 世纪后半期作家作品的译介	(页码)
二、自然主义文学的译介	(页码)
三、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的译介	(页码)
四、唯美主义文学的译介	(页码)
五、新理智派文学的译介	(页码)
第四节 夏目漱石的译介	(页码)
一、1904 年对夏目漱石的译介	(页码)
二、1906 年对《我是猫》的译介	(页码)
三、1908 年对漱石后期作品的译介	(页码)
第五节 日本现当代文学的译介	(页码)
一、左翼文学的译介	(页码)
二、现代派文学的译介	(页码)
三、井上靖历史小说的译介	(页码)
四、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经济小说的译介	(页码)
五、青春小说、爱情小说的译介	(页码)
六、推理小说的译介	(页码)
七、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的译介	(页码)
第六节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译介	(页码)
一、川端康成的译介	(页码)
二、对三岛由纪夫的译介	(页码)
第七节 对朝鲜—韩国文学的译介	(页码)
一、古典文学的译介	(页码)
二、现代文学的译介	(页码)
三、对朝鲜—韩国文学的评论及文学史的研究	(页码)
第八节 对蒙古、越南文学的译介	(页码)
一、蒙古文学的译介	(页码)

二、越南文学的译介 (原12)

第 源 从国别文学研究到总体文学研究

第一节 东方文学总体研究与学科成立 (原14)

第二节 东方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与前景 (原14)

附 录

世纪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论文编目 (原15)

后 记..... (原16)

第一节

对印度文学史的研究

一 研究印度文学史的困难性与重要性

研究印度文学史,比起研究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史,有着两个特殊的困难。困难之一,就是印度古来无“史”。由于宗教文化特别发达,神话传说取代了历史学的功能,印度人对所崇拜的神及神化了的帝王将相的生平事迹,极尽想象和渲染,敷演出汗牛充栋的数不清的神话传说,并且信以为真,却视世俗层面的现实生活为虚幻不可靠,极力超越、解脱,根本不曾考虑记事为实、条缕为史。因此,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却没有一部严格可信的历史学著作。这一点和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直到近代,才有欧洲学者在考古、考证的基础上,参考古代中国及欧洲有关印度的记载,最先为

印度及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学在中国

第一章
印度及南亚、
东南亚各国
文学在中国

员

印度人整理出“历史”来。而研究和撰写文学史著作也是 19 世纪以来西方人学术研究、文学研究的一种常用方式。据说印度最早的文学史也是西方学者写出来的。

现代中国人研究印度文学史的困难之二在语言。公元 19 世纪以后,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印度社会自身的变化,作为宗教祭祀和学术语言而在几千年中被广泛运用的梵语,在印度逐渐式微,各地方语言随之逐渐流行。如北部地区的乌尔都语、旁遮普语、信德语、克什米尔语,中北部地区的印地语、孟加拉语、奥里萨语、阿萨姆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南部地区的泰米尔语、卡纳达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语言,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方言。它们之间虽有相互的影响,但差异颇大,有些甚至属于不同语系。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来,英语又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中间流行。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独立后的宪法不得不兼顾各方要求,将上述十六种语言(包括英语)都确定为法定语言。一个统一的国家竟有这么多不同的法定语言,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情况也给外国人学习印度的语言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近代以来,中国有不少有识之士都关注印度,有的希望借鉴印度沦为殖民地的“亡国”教训,有的寄希望于“佛教救国”,有的试图复兴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他们都希望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印度,但都碰上了语言的屏障。近代著名文化人中,除章太炎、苏曼殊、许地山等极少数学者懂一些梵文之外,懂印度语言的人很少。当年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曾打算跟章太炎学习梵语,但上了几次课,便知难而退;康有为曾西游印度,并著有《印度游记》,但他并不懂印度语言。梁启超对佛教和印度文化很感兴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他也不懂印度语言。对此状况,梁启超在 1905 年曾感慨地写道:“隋唐以降,寺刹遍地,梵僧来仪,先后接踵,国中名宿,通梵者亦正不乏,何故不以梵语,泐为僧课?而乃始终乞灵于译本,致使今日国中,无一梵籍,欲治此业,乃藉欧师,耻莫甚焉。”直到 19 年代后,还是有少数学者,如陈寅

恪、季羨林等，‘藉欧师’学习梵语，并成为现代中国研究印度文化与文学的中坚力量。建国后，北京大学设立了印度语言文学专业，培养了梵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的专门人才，但一般每人只通晓其中一种语言。

尽管了解印度文学有着这些特殊的困难，但我国学者深知印度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我国文学的密切关系。在过去上千年中惟一对中国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文学只有印度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并且泽被周边诸国，但自东汉以来的上千年间却持续不断地接受印度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这足以表明印度古典文化与文学的巨大魅力，并足以激起现代中国人了解印度文学的冲动。而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假如没有印度文学史的知识，就会对中国文学中的许多问题，如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中国古代的翻译文学问题、印度声韵学与中国诗歌韵律的问题、梵剧与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中国志怪、神魔小说与佛经故事问题，乃至中国现代史上东西方文化优劣问题的论战与印度诗圣泰戈尔访华、泰戈尔与中国现代“小诗”的形成等等问题，不可能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习西方文学（还有东方的日本文学）固然是时代大潮流，但不少学者和文学家们并没有忘记和忽视印度文学。

■ 两种《印度文学》

而要系统地阐述印度文学，要广泛、全面地发表对于印度文学的看法，就必然要使用“印度文学史”这种著作形式。

于是，到了 1941 年，这样的著作出现了，那就是许地山的《印度文学》。

许地山（1898—1941）的《印度文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1 年初次出版发行，鉴于它填补了空白，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较大，1945 年和 1953 年两次再版。这本书虽然不称为“印度文学史”，但它其实是一本系统叙述从古代到近代印度文学发展进程的文学史

著作。之所以不称“史”,也许是因为该书在资料和篇幅上还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全书只有六万五千字),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印度文学史的概论。这部书在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中的地位,是由它的开拓性所决定的。首先,在印度文学史的分期上,它做了这样的划分:

第一期 吠陀文学或尊圣文学

 吠陀 圆净行书或奥义书 圆经书

第二期 非圣文学

 圆佛教文学 圆耆那教文学

第三期 雅语文学

 圆科学 圆赋体诗与往世书 圆寓言与戏剧

 圆兴体诗 圆佛教文学

第四期 近代文学

 圆雅语 圆俗语与外国语

这是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切实可行的划分方法。鉴于印度历史从朝代更替到作家生平许多都是一笔糊涂账,而文学作品大都不是作家个人的创作,而是逐渐累积、长期形成的,因此很难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来将作品定位。像中国文学史著作那样按朝代更替来作为划分印度文学史的根据,是不可行的。因此,只能将时间相对模糊化,大体按作品先后顺序及作品的类型来分期。许地山的《印度文学》的这种文学史划分法,对后来的同类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4年出版的柳无忌的《印度文学》,乃至当代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都大体延用了这样的方式。

许著《印度文学》作为第一部印度文学史的著作,其中必然涉及到印度文学史的许多专门名词和术语的汉译问题。此前,我国历代翻译家们曾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有些名词的翻译已经固定化,许著《印度文学》采用了不少这样的译词。但佛教文学之外

的印度文学术语、名词,在没有译词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自行译出。这些名词术语的翻译,有不少为后来的学者所袭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许地山还将四部《吠陀》本集分别意译为《赞颂明论本集》、《歌咏名论本集》、《祭祀明论本集》、《攘灾明论本集》。这里的“明”字,取汉译佛教典籍的含义,即许地山所解释的“知识”。这种意译使人望名会义,堪称巧妙。后来,有些学者(如柳无忌)仍然袭用许地山的这些译名。此外,《往世书》、《五卷书》等作品译名,以及两大史诗中的人名,如罗摩、悉多、难敌、坚阵(战)、广博等,也是首次由他译出,并被后人延用或部分延用。还有一些名词,许地山使用了汉语文学中的相关名词来移译。例如,他把《吠陀》中的颂神的抒情诗,统称为“颂”,把“雅语文学”时期的抒情诗称为“兴体诗”,把叙事诗比做“赋体诗”。虽不尽恰切,但对于帮助我国读者理解印度文学是不无助益的。不过,在对印度文学中一些重要体裁样式的表述方面,也有不够到位的地方。例如,把吠陀文学称为“尊圣文学”,而把佛教文学和耆那教文学称为“非圣文学”。为什么这么界定?作者也没有交待。他似乎是想说明:吠陀文学属于正统的吠陀教——婆罗门教,而佛教文学和耆那教文学都是反正统的,也就是“非圣”的。但这样区分显然有问题:吠陀教有吠陀教的“圣”,佛教和耆那教也有佛教、耆那教的“圣”,何况佛教、耆那教的兴起晚于吠陀教上千年,所谓“尊圣”和“非圣”也就没有同一时间段上的对应性了。另外,在对《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体裁性质的表述上也有些问题。从体裁上看,这两部作品是“史诗”。虽然“史诗”(Epic)这个词来自西文,在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没有这个概念,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与希腊的荷马史诗完全同类,这在现在来说已是常识。但由于当时研究状况的局限,许地山对两部作品,并没有“史诗”的明确意识,在《印度文学》中,甚至没有使用“史诗”这个词,而是分别使用“如是所说往世书”和“钦定诗”这两个概念来表述《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体裁性质。许地山是这样表述的:“我们可以把印度的赋体

诗分为两类,一类是《如是所说往世书》(阿婆罗原梵文译),一类是诗或钦定诗(云云)。如是所说与我国古赋底体裁很相同,但在印度文学里,这个名词兼指历史、小说、寓言等作品而言。他把《摩诃婆罗多》划归为“如是所说往世书”这一类。又说:之所以把《摩衍那》称为“钦定诗”,是“因为这类诗的作者多半是与朝廷有关系的人,所以也名为‘钦定诗’或‘大诗’”。这里使用的似乎是印度固有的概念,但现在看来,“钦定诗”的说法并不确切。一是因为《摩衍那》原本是在民间神话传说的基础上经无数文人整理加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成形的,很难断言“钦定”;二是如果说“钦定”,印度的宫廷文学都可以说是“钦定”,并非只有《摩衍那》如此。由此可见,不从“史诗”的角度来认识《摩诃婆罗多》和《摩衍那》这两部作品,就难以把握它们的根本性质。当然,作为中文版本印度文学史的开山著作,这些局限也是难免的,不好苛求作者。

许著《印度文学》之后的第二部印度文学史著作是柳无忌的《印度文学》。柳著《印度文学》1934年10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1935年重印,1945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修订再版。可见这部书的影响范围之大,时间之长。全书约十四万字,在篇幅上是许著一倍多。柳无忌是学西洋文学出身的人,印度文学并非他的专攻。据作者在联经版的“后记”中说:他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1934年在清华大学随父亲研究苏曼殊,是苏曼殊所翻译的有关印度的诗歌引导他“神往印度文学”;其次是对泰戈尔的敬慕,由“对于这位近代印度诗人的敬慕,扩展到对古代印度文学的憧憬”,便下决心探寻印度文学中珍贵的宝藏。在资料来源方面,作者大量吸收了有关印度文学研究的英文材料,这从书后所胪列的十八种英文书目便可看出。同时,也受到了许地山《印度文学》的多方面的启发和影响。书中多次征引许著中的观点和材料,许多译名也采自许著,同时在许著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和完善。例如,在《摩诃婆罗多》和《摩衍那》两部作品中,柳著虽然延用了许地山

的“钦定诗”、“如是所说往世书”之类的提法,但他明确把《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作为“史诗”来看待,并论述了他们作为“史诗”的文学特征。再如近代文学部分,柳著大大地拓展了论述的范围。对于泰戈尔,许著只有二三百字的篇幅,而柳著则作为全书的重点,着墨最多。柳著对于孟加拉短命女诗人陀露哆(1897-1935)高度重视,用单章的篇幅专门讲述,这似乎是受了苏曼殊的影响。陀露哆是苏曼殊所译介的为数不多的近代印度诗人之一,也是柳无忌通过苏曼殊的译文最早接触的印度诗人之一。但是现在看来,陀露哆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像她在柳著《印度文学》中那么高。也许是因为如此,后来出版的印度文学史著作甚至连陀露哆的名字都找不到了。在最后一章《印度独立前后的文坛》中,柳无忌认为印度独立前后出现了三位杰出的作家,那就是乌尔都语诗人伊克巴(今译伊克巴尔)、英语诗人奈都夫人、以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双语写作的小说家普雷姜德(今译普列姆昌德)。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在研究与写作方法上,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本书的写作,侧重古印度文学的每一门的一、二部代表作品。及近代印度文学的两位代表作家以为论述的中心,详细评介,而并非史的、综合的、概括的平行的叙述。”话是这么说,但全书还是以历史为经,以重点作家作品为纬的。它删繁就简,将头绪纷繁、内容庞杂的印度文学加以筛选和简化,用史的线索将重点作家作品的评述串连起来。它虽然还算不上是详实的印度文学史,但起码也要算是一本印度文学史的简编了。全书简明扼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印度文学的热爱之情,富有感染力。从框架结构到行文叙述都极为清晰明白,对于初学印度文学的读者尤其有益。在印度文学史时期的划分上,柳著在许著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印度文学史的划分加以简化。许地山将印度文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而柳无忌则把三千年来的印度文学分为三大时期,即吠陀文学时期、雅语文学时期、近代的白话地方文学时期。作者解释说:“第一为吠陀文学,约自西元前十世

纪至西元后一世纪,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完全是宗教文学。第二期始于西元一世纪,以迄西元十二世纪回教徒入侵之时,可称为雅语文学”,而 13 世纪以后,“在印度文学史上是一个较为黑暗的时代,一直到西元 15 世纪后,近代的白话地方文学渐渐兴起……”。这样的三分法固然将印度文学史简明化了,但也造成了许多不该有的遗漏。如,在印度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佛教文学,被排除在外了。虽然作者在讲述《五卷书》的时候简单地交待了印度的民间文学,但民间文学并不等同于佛教文学。他一方面承认佛教文学非常的丰富,但又认为佛教文学中“极少抒情的纯文学作品,说教示范的性质重而想象的成分少,不如吠陀颂那样可视为印度文学主流。”实际上,印度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渗透着宗教意识,只是程度不同、表现方式有别罢了,不能单以宗教性质作为印度文学史上作家作品轻重取舍的主要依据。

三 梵语与印地语文学专史

上述两种《印度文学》,虽然是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但作者不称其为“史”,这除了作者的谨慎和谦虚之外,还在于它们在字数规模和研究深度上,基本上是适合普及的需要的。建国后的 1950 年代初,严格意义上的印度文学史的著作出现了。首先问世的是金克木(1912-2008)教授的《梵语文学史》。

《梵语文学史》是金克木 1950 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使用的教材,到 1959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5 年再版,全书近三十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梵语文学史,第一部由通晓梵语的人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梵语文学史,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印度文学史。它资料丰富详实,内容全面系统,论述严谨,分析透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梵语文学史体系,确立了梵语文学史的基本内容,从阅读原作入手对作家作品、特别是重点作家作品做了透彻的阐释和自己的评价,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同时也带有它写作与出版的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